

社區領袖在社區防災的角色與職責

張麗珠

壹、前言

由於臺灣的地理位置，常見的天然災害有颱風、水災、土石流等，近年來因受極端氣候的影響，甚至連龍捲風都可能發生。根據世界銀行針對天然災害熱點報告（Dilley et. al., 2005），臺灣位於天災風險相對高的地區，幾乎整個臺灣（約99.1%的土地總面積和98.9%的人口）都面臨兩種或兩種以上的天然災害風險，天災致死高風險人口高達95.1%。天災不僅造成人員傷亡及財產損失，對經濟的衝擊也不容小覷，有鑑於此，各級政府不斷規劃和實施各種建構災害管理量能的方案，如災害防救深耕計畫即是提升縣（市）政府與鄉（鎮市區）公所災害防救能力，及強化民眾自救與互救防災意識（內政部消防署，無日期a；無日期b）。

再者，災害直接衝擊受災民眾的身心靈健康及社會支持網絡，如何強化各級政

府提供防救災社會服務的量能便成了重要課題。防救災社會服務的提供需要跨部門合作、公私部門的協同合作，並為可能在災害情境下工作的各組織和專業人員，甚至社區領袖提供相關的培訓計畫。當災害發生時，社區領袖是及時提供防救災社會服務的重要人力資源，他們的領導能力、在地智慧、第一手災害訊息、對在地文化脈絡的熟悉度與人脈關係，以及資源連結能力等都是防救災社會服務極其寶貴的資源。例如，2009年莫拉克風災來襲時，臺東縣金峰鄉嘉蘭社區發展協會與農村再生促進會便在災害應變與災後復原中發揮了關鍵的協調角色。所成立的社團法人臺東縣原住民嘉蘭災難自救暨文化經濟產業促進會更成為日後部落防救災資源動員的重要組織（王俊豪、陳美芬，2015）。

本文是單一整合型計畫的部分初步研究結果，在此僅聚焦於社區領袖過往災害整備、災害應變及災後復原重建實務

經驗的整理，研究場域為屏東縣，討論「根源」和「人脈關係」在臺灣文化中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偏鄉地區。雖然很多中南部的人因為工作機會、教育或其他原因北漂，離開他們土生土長的地方。然而，許多人選擇在退休後，甚至退休前搬回故鄉，只因為那是他們的根源所在（Huang, 2018; Jang & Wang, 2009）。這種歸屬感可促使社區居民共同努力做好備災工作，這樣的社區參與（community participation, CP）依照社區自主參與理論（community engagement theory, CET）的解釋，可以產生集體效能（collective efficacy），並共同建構具有防災量能的韌性社區（王价巨等人，2016；Jang et al., 2016）。本研究採用社區自主參與理論（Paton, 2006, 2008）解釋社區領袖在防災社區的角色和功能。

參與本研究的社區領袖共有四名村長、四名社區發展協會（前）理事長、二名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以及三名社區發展協會幹部。研究結果顯示：（一）社區領袖的災害應變經驗可提升他們表達社區觀點的勇氣；（二）以身作則的領導方式可強化社區凝聚力；（三）在地社區領袖與耆老是社區議題的專家；（四）長輩是防災社區的寶；（五）社區主導的備災和災害應變模式可促使在地居民提出解決方案和優先處理事項。最後本文討論研究結果的意涵及研究限制。

貳、屏東縣防救災社會服務概覽

屏東縣常見的天然災害有水災、土石流、地震等，根據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NCDR）（無日期）報告顯示，從2015年到2022年每年都因颱風或豪大雨造成農林漁牧業損失，其易致災區多位於原鄉部落所在的山區和漁塭林立的沿海地區。

防救災社會服務需要跨部門協同合作（王秀燕，2010；吳麗雪、趙若新，2010；林珍珍、林萬億，2014），在縣層級，社會處主責救災物資和避難收容，為履行這一職責，社會處需要與負責原住民疏散撤離的原民處、負責非原住民疏散撤離的民政處、負責受災民眾救援及傷患救護的消防單位、負責救災物資輸送和車輛調度的後備指揮部和交通旅遊處，以及負責傷患救護及疫病防治的衛生局密切合作（吳麗雪、趙若新，2010；屏東縣政府社會處，2015），屏東縣各單位在災害應變的角色與功能如圖1。

社會處由六科組成，即婦幼科、長青科、身心障礙福利科、社會工作科、社會行政科和社會救助科。為強化災時應變能力，六科依據專業知能與業務特性預先做好災時編組，社會救助科是社會處災害應變的統籌總窗口；社會行政科負責災變志工的招募和管理；社會工作科負責服務避難收容處所的鄉親；身心障礙福利科負責救災物資的調度；長青科負責所有社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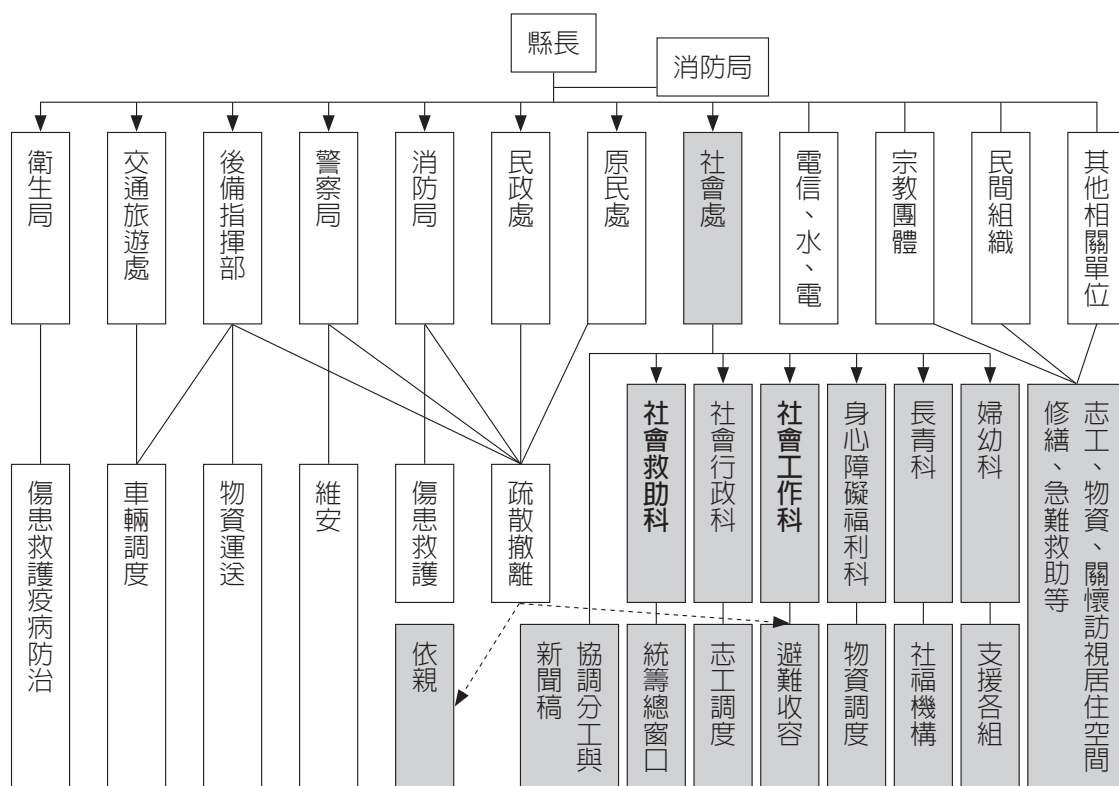


圖 1 屏東縣各單位在災害應變的角色與功能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福利機構；婦幼科負責支援各組（吳麗雪、趙若新，2010；屏東縣政府社會處，2015）。

防救災社會服務工作者服務的對象可能是在災難中失去親人的倖存者、住院的傷患、遭受嚴重財產損失並需要臨時住所的受災戶，或是生活在受災社區的一般民眾，他們可能沒有明顯的人員傷亡或財產損失，但飽受驚嚇，身心疲累焦慮。基於身心靈健康考量，受災民眾的臨時避難收容可優先考慮依親的可能性，與受災地區

外的親屬同住，可以降低受災民眾的焦慮感及在避難收容處所的適應議題（張佳樺等人，2021）。如果需要避難收容的人數不多，將業務外包給旅宿業可以是一個多贏又利多的選擇，如旅宿業可以在災時持續營運、受災民眾可以享有較好的生活品質與隱私、防救災社服人力可以聚焦在急迫性的危機處理。

受災群眾的身心靈健康照護也是防救災社會服務工作者需要關注的，整體來說，臺灣人是敬畏鬼神且對宗教相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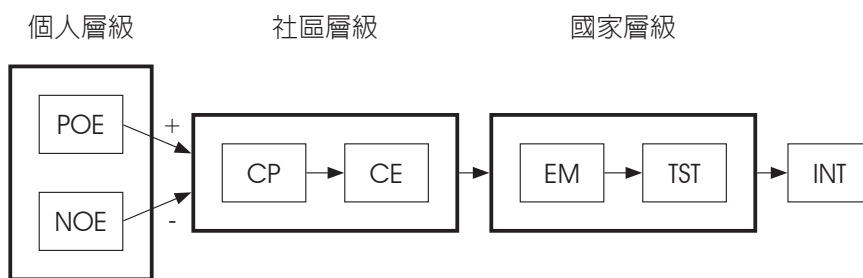


圖 2 社區自主參與理論 (Community Engagement Theory)

資料來源：Paton (2016)。

虔誠的，在原鄉部落有許多基督教和天主教堂，而沿海鄉鎮則有許多傳統宗教寺廟和道觀，宗教組織的適時介入可以緩解受災民眾的恐懼和焦慮情緒。Jang與LaMendola (2007) 研究發現，相較於專業諮商服務，受災民眾更信任或更能接受宗教團體的介入（如：民俗療法——收驚）。此外，地方性或全國性的大型宗教團體和非營利組織的介入，可以提供在地所需的人力和救災資源，彌補政府資源不足的服務內容和範圍，如房屋修繕、急難救助或災難補助。

參、社區自主參與理論

因社區自主參與理論是一個經過多元災害（如：地震、森林火災）及個人主義文化（如：紐西蘭）與集體主義文化（如：臺灣）檢測的跨文化全災害理論（Paton, 2016; Paton & Jang, 2011, 2016; Paton et al., 2015），所以本研究使用它來

解釋研究結果，CET主張正向結果預期（Positive Outcome Expectancy, POE）、負向結果預期（Negative Outcome Expectancy, NOE）、社區參與（Community Participation, CP）、集體效能（Collective Efficacy, CE）、賦權（Empowerment, EM）和信任（Trust, TS）會影響人們對防救災整備的意圖（Intention, INT）（見圖2）（Paton, 2006, 2008）。

正向結果預期係指人們相信備災可以降低災害風險並提升人們的安全，持此信念者相對願意做防災整備，若有備災資源及可信任的資訊，則會實際採取行動。負向結果預期是指人們認為災難後果過於慘烈震撼，個人作為無法對人身安全和財產損失產生任何作用，持此信念者的備災意願相對低（王价巨等人，2016；Jang et al., 2016）。社區參與是指積極參與社區公共事務，透過社區事務的參與，民眾不只互相交換訊息，同時也擴張彼此的社會支持網絡。集體效能是指社區居民評估

社區量能和資源需求並製定計畫以利用資源因應挑戰性任務的能力（Paton, 2006, 2008）。賦權是指若民眾與政府的互動經驗是正向的，並相信他們與政府的關係是公平和賦權的，他們會更有意願為自己的安全負責，並採取必要措施積極管理可能的災害風險。若民眾不認為與政府的互動關係是公平和賦權時，後果是對政府或災害信息來源失去信任（Paton, 2008）。因天然災害具高度不確定性，使得社區居民高度依賴外來的災害和整備訊息來源，所以信任特別重要。社區居民對災害訊息來源的信任程度會影響他們使用訊息的意願（Paton, 2006, 2008）。

肆、研究方法

本研究目的在檢視社區領袖過去災害應變及現在推動防災社區的經驗，採用焦點團體和個別深度訪談蒐集資料。因為臺灣人相當重視「人脈關係」（Jang & LaMendola, 2006, 2007; Jang & Wang, 2009; Paton et al., 2016），人脈或關係是完成工作或使工作進行得更順利的重要因素，因此採用立意抽樣，先從防救災深耕計畫團隊中檢選2名與在地社區發展協會合作推動各種備災方案多年的重要信息提供者（key informant），透過他們的協助，研究者邀請到來自7個鄉鎮的13位社區領袖參與（詳見表1）。因多位村長認

為防災社區計畫是社區發展協會的業務，建議訪談協會幹部即可，故7個鄉鎮僅有4位村長受訪。為使訪談順利與聚焦，研究者在約訪時先寄訪談大綱（見表2）給受訪者參考。

伍、研究結果

從受訪者的備災、災害應變和災後復原的經驗分享，研究者發現可以驗證社區自主參與理論的概念（Paton, 2006, 2008），同時也歸納出下列五個能促進防災社區發展的因素。（一）社區領袖的災害應變經驗可提升他們表達社區觀點的勇氣；（二）以身作則的領導方式可強化社區凝聚力；（三）在地社區領袖與耆老是社區議題的專家；（四）長輩是防災社區的寶；（五）社區主導的備災和災害應變模式可促使在地居民提出解決方案和優先處理事項。逐項說明如下。

一、社區領袖的災害應變經驗可提升他們表達社區觀點的勇氣

受訪的社區領袖在分享救災經驗時，不約而同地談到10多年前重創臺灣的莫拉克風災，受訪者L02、C01、C03、C04、C06、C07、C08均提到，社區領袖和居民的災害風險和備災意識，因經歷莫拉克風災及其他天然災害而被提高，使他們更勇於直接或透過大眾媒體和社群媒體間接

表 1 受訪者基本資料、社區常見災害類別與社區參與

ID	性別	年齡	社區工作年資	職稱	災害類別	社區參與
C01	女	60+	20+	前理事長	颱風、水災	社區發展協會、防災士、環保志工、水利志工、社區志工
C02	男	70+	16-20	社區幹部	颱風、水災	環保志工、社區志工
C03	男	70+	1-5	總幹事	颱風、水災	社區發展協會、防災士、環保志工、水利志工、社區志工
C04	男	70+	1-5	理事長	颱風、水災	社區發展協會、防災士、環保志工、水利志工、社區志工
C05	男	60+	1-5	社區幹部	颱風、水災	社區發展協會、環保志工、水利志工、社區志工
C06	男	50+	1-5	理事長	颱風、土石流、孤島效應	社區發展協會、防災士
C07	女	60+	6-10	總幹事	颱風、水災	社區發展協會、防災士、環保志工、水利志工
C08	女	50+	1-5	社區幹部	颱風、水災	社區發展協會、防災士、社區志工、水利志工
C09	男	50+	1-5	理事長	颱風、水災	社區發展協會、防災士、社區志工、水利志工
L01	男	70+	1-5	村長	颱風、水災	社區發展協會、疏散撤離、臨時避難收容
L02	男	70+	16-20	村長	颱風、水災	韌性社區、疏散撤離、臨時避難收容
L03	男	70+	1-5	村長	颱風、土石流、孤島效應	韌性社區、疏散撤離、臨時避難收容
L04	男	60+	20+	村長	颱風、水災	疏散撤離、臨時避難收容

註：L＝村長；C＝社區發展協會。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向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表達社區的觀點與需求。

多年前，村長L02不忍心看著自己土生土長的村子逢雨必淹，就和當時的村長

表 2 訪談大綱

過去經驗	1. 請分享您參與災害應變的經驗
	2. 如果重新經歷，您會採取哪些不同的因應措施
	3. 請問您對於防救災社服人員的建議
現況	1. 在地社區可能面臨哪些災害—天災、人禍、疫病？
	2. 請問貴社區的災害應變SOP
	3. 請問貴社區在社區自主防災的角色與功能
	4. 請您分享面臨災害時，跨社區合作的經驗
	5. 請問您認為影響社區民衆參與社區自主防災的因素為何
	6. 請問您認為如何激勵社區民衆參與
	7. 請問您認為推動社區自主防災需要那些資訊、支援及資源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商量爭取政府補助社區治水工程的可能性。當時的村長持有負向結果預期信念，認為逢水必淹是因為村莊地處河流下游出海口附近，飽受淹水之苦是當地村民的宿命，個人的作為無法對村民們的人身安全和財產損失產生任何作用。

但是，L02認為事在人為，他深信備災可以降低災害風險，增加社區居民的安全（即正向結果預期）。帶著強烈的社區歸屬感和深厚的地方依附（place attachment），L02堅定地投身於社區事務，這體現了社區自主參與理論的一個重要概念——社區參與。為了擁有可參與村裡事務決策的行政權力，讓村朝著更好的方向發展，L02參加了村長競選活動，截至訪談時，L02已經擔任了16年多的村長。如同社區自主參與理論所主張的，正

向結果預期、社區參與和集體效能可以強化備災意圖（intention），進而採取行動（Paton, 2006, 2008）。在L02和社區居民的共同努力下，暴雨已找到回大海的路，村莊逢雨必淹的問題已獲得改善。L02與社區居民一起，以共善共榮（即集體效能）的理念，逐步實現建構防災社區的夢想。

二、以身作則的領導方式可強化社區凝聚力

論及莫拉克風災的救災經歷，L02自述在救災期間，他每天從早上5點工作到晚上8點，每天都去國道3號的臨時救災物資站領取物資，在社區志工的協助下，他們一起把物資分發給村裡有需求的人，以確保每個家庭都有基本的生活必需品。

L02感謝在救災及災後復原重建期間與他密切合作的在地社區志工們（即社區參與），他們盡最大努力為社區服務。L02自豪地聲稱他們的村莊是最早完成災後復原的村莊之一（即集體效能），他和在地志工們還協助鄰村清理泥濘的家園（即自救與互救）。

來自原鄉部落的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C06評論說，原住民族與他們的族群有著緊密的關係，部落居民對保護族群有共識，團結是部落村民的重要身分認同。每當災害發生時，部落民眾立刻準備到前線工作。C06指出，家有挖土機、山貓或其他重型機具的人都會主動趕往受災地區並清除崩落的砂石，以確保連外道路暢通無阻，他們的服務都是自願性的（即社區參與）。

談到社區發展，C09表示，作為協會幹部，他們投入全部心力為提高社區知名度而努力，他深知，要經營一個具在地特色的永續社區需要自力更生和財務獨立。C09和協會幹部進行全面性的社區資源盤點（即社區參與），以此作為開發生態旅遊路線的基礎。C09強調，「我當時的主要觀點是想把社區居民凝聚在一起，還有協會需要自力更生和財務獨立」。如今，他們的社區生態旅遊不僅為全職媽媽和退休人員提供兼職工作機會，還有穩定的收入來支持協會和關懷據點的運作（即集體效能）。

受訪者L01和C01以及受訪者L02和C02的例子顯示村長和協會理事長之間有共識，方能一起為社區的福祉而努力。C06將自己比喻為參謀長而村長是指揮官，他說：「遇到緊急情況，村長下達的決策和命令，我都會執行，立即著手調度災害資源和人力」。村（里）長和協會幹部密切合作的另一個例子是C09，她形容村長是個草根性很強的人，因為他對人對事的態度，所以社區裡的人都非常喜歡他。他對待社區居民就像對待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樣。他不僅以身作則帶領社區，且言出必行。資料分析顯示，受訪的村長和協會領袖展現出領導社區的承諾和熱忱，以身作則不僅能使在地社區領袖贏得社區成員恆久的信任關係，還能增強社區的凝聚力。

三、在地社區領袖與耆老是社區議題的專家

在地領袖與耆老不僅熟悉社區的地形地質，還熟悉風土人情和文化禁忌，並擁有深厚的人脈關係。他們可以做一些學者專家可能做不到的事情。例如，學者專家不會選擇暴風雨天去巡視社區的水流路線，但在地社區領袖會這麼做。當治水工程遇到釘子戶時，外來的學者專家可能不會花時間與地主協商並試圖賠償他們的損失，但在地社區領袖會這麼做。

與沿海村莊相比，原鄉部落的災難

救援工作似乎更加複雜和具挑戰性。C06指出，由於部落的特殊地理環境，當發生重大災害時，那些負責救災工作的公部門和承包救災業務的組織往往很難找到必要的機具和物資來支援受災的部落。由於車輛需要在非常崎嶇不平的道路上行駛，普通車輛不一定能到達目標地點。有能力提供一定數量的救災物資並獲得政府簽訂救災物資支援協定資格的企業，往往位於非山區甚至市區，由於地理位置和路況的限制，救災物資承包商要履行支援協定義務有一定的困難度，更別談滿足部落居民的需求。C06強調部落已有自己的社區救災小組，災害發生時，社區災害應變團隊是有能力立即採取必要的救援行動。

L01和C01分享在莫拉克颱風期間，因上游受災民眾的屍體被沖進社區，外來的搜救隊，由於不熟悉當地地形，車子經常被困在地勢低窪的地方。C01進一步解釋說：

因為他們不熟悉村裡的方向和路線，所以我們的巡守隊帶他們到達目標地點。如果沒有在地巡守隊的協助，外來的搜救隊可能無法執行任務。（C01）

四、長輩是防災社區的寶

根據屏東縣政府民政處（2021）的統計資料，2020年11月，屏東縣65歲以上人口比例高達17.96%，屬世界衛生組織定義的高齡社會。此外，85歲以上人口占全

部老年人口的比重為10.59%。不過，不少受訪者提醒研究者，不宜假設老年人，尤其是獨居老人急需幫助或無行為能力。事實上，大多數社區發展協會的幹部都是退休長輩，他們不僅熱衷為人服務、健康狀況良好、財務自由且空閒時間多。年齡越長者，生命歷練越豐富，見識越廣，這些活躍的在地長輩是防災社區的重要資產。他們不僅熟悉當地的災害歷史、特點和易受災地區，而且對社區風俗習慣、文化認同和社區事務有較大程度的了解。參與研究的13位社區領袖中，有6位70歲以上，他們豐富的人生閱歷和服務社區的意願，實為社區之福。

五、社區主導的備災和災害應變模式可促使在地居民提出解決方案和優先處理事項

災害應變經驗豐富的L02回憶說：「莫拉克颱風的救災人員大多是外地來的，很多救災人員和災變志工來支援我們」。因為這些外地人不熟悉社區的文化和地形，L02便將在地志工分成幾個小組與他們一起工作。不管志工是以團隊或個人的形式前來，在地志工都會明確告知向誰報到，例如，社區打掃歸A組，重機具作業歸B組，清溝歸C組，發放救災物資歸D組等。L02強調：

每天晚上，我會再檢查一次社區的災後復原進度。我會檢查村內每條大街小

道，以確認第二天需要清運的垃圾量與地點及需要的卡車數量。（L02）

他自豪地說，他們村是第一個完成災後清理工作的村子。

談到社區主導的治水工程，自嘲是半文盲的L02卻得意地說自己的在地經驗和治水知識絕對比具水保博士學位的知名學者專家豐富，L02說：

我的治水方式是，下大雨的時候，我會沿著河道走，檢查水的流向。治水之道必須從下游做起，再向上游逐步整治洪水問題。（L02）

L02爭取到治水工程的補助款，為確保工程能順利進行，L02與可能受到治水工程影響的地主進行協商，他甚至透過社區募款來籌集資金以補償地主因土地被徵收的損失。

陸、結論與建議

天然災害的發生似乎是臺灣人的生活日常，臺灣人也在學習與災害共存（Paton et al., 2016）。「經驗是智慧之父」，期望豐富的災害應變經驗可以成為推動防災社區的養分。受災民眾經歷幾次災害衝擊後，學會勇敢地表達社區的在地觀點。如沿海村落長年遭受水患之苦，村長號召村民們為保住自己的家園，齊心協力做好治水工程，並向地方和中央政府提出具體建議，成功爭取到政府的補助。

Lloyd與Hopkins（2022）建議社區須根據在地知識、偏好、優先處理事項和價值觀提出解決方案，社區不能再簡單地提出問題，他們必須提出解決方案和優先處理事項。這與CET中賦權的重要概念相呼應。如果人們的經驗和相信他們與政府的關係是公平和賦權的，他們會更願意採取必要措施積極管理可能的災害風險。為減少沿河地主的損失，村長透過社區募捐，為地主因土地被徵收的損失籌集補償資金。這呼應CET所強調的與政府建立賦權與信任關係的重要性。協力合作完成的治水工程對改善社區淹水問題發揮功能（即集體效能）。

上述社區主導的減災工程成功案例，可以用CET來解釋，即透過社區參與，社區民眾共同討論治水問題，獲得防災量能或減災訊息，社區民眾共同出錢出力，形成共識。通過共同努力，他們不僅成功地爭取政府的補助，還順利取得治水工程所需的土地，完成防洪改善工程，降低社區的淹水風險（即集體效能）。

以身作則可增強社區凝聚力，採取行動比口說更具說服力。群眾在效仿之前需要先看到初步結果，社區領袖一開始可能會很孤單，但逐漸會有越來越多人加入團隊。真誠可以吸引社區成員的注意，當社區成員意識到他們也在同一條船上時，他們會更願意參與（即信任領袖和其所提供的訊息）。社區群眾是可以追根溯源的、

對土生土長的地方有人脈關係、有歸屬感、有地方依附，這些連結讓群眾更有意願參與社區事務（即社區參與）。他們了解在地文化背景脈絡和環境景觀，這是他們患難與共的地方。與政府或學者專家相比，在地人是社區議題的專家，尤其是社區中的長輩更是防災社區的寶貴資產。他們可能沒有體力再耕種，但他們的在地智慧可以傳承，嘉惠後代子孫。

如前所述，屏東縣大部分易致災區位於部落和沿海鄉鎮，這些地區的防救災整備資源相對匱乏。如何對接外部資源？如何幫助政府看到在地社區的需求，聽取他們的意見，需要社區領袖和社區成員的共同努力。Lloyd與Hopkins（2022）從當地的災後復原重建經驗中學習，他們強調與政府和災難救援服務機構建立關係和信任至關重要。

本研究雖盡力蒐集相關資料，但仍有幾項限制，例如，屏東縣共有33個鄉鎮市，但受訪的社區領袖僅來自7個鄉鎮，包括2個部落鄉鎮、4個沿海鄉鎮和1個相對都市化的農業鄉鎮。雖然可以看到社區領袖在推動防災社區的角色與功能，但

若要將此研究結果推論到整個屏東縣或臺灣仍需謹慎。在受訪的村長中，只有L02具有比較完整的災害應變經驗，其他3位村長認為防災社區的任務和責任屬於社區發展協會的工作範疇，他們沒有太多的參與。為了更全面地了解防災社區的實施情況，需要所有參與的鄉鎮和村莊提供完整的信息，後續可再針對其他鄉鎮市的社區領袖進行了解，特別是對於推動防災社區興趣缺缺的社區與鄉鎮，以利更具體地了解阻礙社區防災整備的因素。

※本研究由科技部補助，計畫編號MOST 110-2124-M-020-001-。本研究經國立成功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成大倫審會（簡）字第109-324-2號。感謝所有受訪者慷慨分享寶貴的實務經驗，感謝董柔妤及陳怡如研究獎助生協助資料的蒐集與整理。

（本文作者為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副教授）

關鍵詞：社區領袖、社區防災、社區自主參與理論、社區參與、集體效能

參考文獻

內政部消防署（無日期a）。〈防災士培訓〉。<https://pdmcb.nfa.gov.tw/dp/intro>

內政部消防署（無日期b）。〈推動韌性社區〉。<https://pdmcb.nfa.gov.tw/dc/intro>

王价巨、張麗珠、Paton, D.（2016）。〈臺灣防災準備模式與文化差異的探討——以地震災害為

- 例》。《環境規劃與管理》，43（3），315-337。https://doi.org/10.6128/CP.43.3.315
- 王秀燕（2010）。〈政府與民間的災變管理合作機制之探討〉（論文發表）。2010年兩岸社會福利論壇——災害救助與社會工作，臺北市，臺灣。http://www.cares.org.tw/CaresPortal/benefit/forumPdf.do?forum_id=473
- 王俊豪、陳美芬（2015）。〈原住民部落因應氣候災害風險之行動研究〉。《台灣農學會報》，16（3），197-211。https://doi.org/10.6730/JAAT.201509_16(3).0001
- 吳麗雪、趙若新（2010）。〈地方政府社政體系在救災過程中的任務、角色與困境——高雄縣政府莫拉克風災救災經驗〉。《社區發展季刊》，131，16-32。
- 林珍珍、林萬億（2014）。〈莫拉克風災後高屏地區重建服務網絡之研究：災難治理的觀點〉。《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52（3），5-52。
- 屏東縣政府社會處（2015）。《屏東縣政府社會處災害防救應變計畫》。https://www-ws.pthg.gov.tw/Upload/2015pthg/oldfile/UserFiles/屏東縣政府社會處災害防救應變計畫(1).pdf
-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無日期）。〈屏東縣〉。全球災害事件簿。https://den.ncdr.nat.gov.tw/1178/1661/
- Dilley, M., Chen, R. S., Deichmann, U., Lerner-Lam, A. L., Arnold, M., Agwe, J., Buys, P., Kjekstad, O., Lyon, B., & Yetman, G. (2005). *Natural disaster hotspots: A global risk analysis*. The World Bank.
- Huang, S. M. (2018). Heritage and postdisaster recovery: Indigenous community resilience. *National Hazards Review*, 19(4). https://doi.org/10.1061/(ASCE)NH.1527-6996.0000308
- Jang, L., & LaMendola, W. F. (2006). The Hakka spirit as a predictor of resilience. In D. Paton & D. Johnston (Eds.), *Disaster resilience: An integrated approach* (pp. 174-189). Charles C. Thomas.
- Jang, L., & LaMendola, W. F. (2007). Social work in natural disasters: The case of spirituality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Advances in Social Work*, 8(2), 305-316. https://doi.org/10.18060/208
- Jang, L., & Wang, J. (2009). Disaster resilience in a Hakka community in Taiwan. *Journal of Pacific Rim Psychology*, 3(2), 55-65. https://doi.org/10.1375/prp.3.2.55
- Jang, L., Wang, J., Paton, D., & Tsai, N. (2016).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s between the earthquake preparedness models of Taiwan and New Zealand. *Disasters*, 40(2), 327-345. https://doi.org/10.1111/disa.12144
- Lloyd, J., & Hopkins, C. (2022). Community-led disaster recovery—Mallacoota, Victoria.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37(4), 8-9.
- Paton, D. (2006). Disaster resilience: Integrating individual, community, institu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perspectives. In C. C. Thomas, D. Paton, & D. Johnston (Eds.), *Disaster resilience: An integrated approach* (pp. 306-319). Charles C. Thomas.
- Paton, D. (2008). Risk communication and natural hazard mitigation: How trust influences its effectiveness.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Issues*, 8(1), 2-16. <https://doi.org/10.1504/IJGENVI.2008.017256>
- Paton, D. (2016).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Cross cultural perspectives*.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ingtung, Taiwan.
- Paton, D., & Jang, L. (2011). Disaster resilience: Exploring all-hazards and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In D. Miller & J. Rivera (Eds.), *Community disaster recovery and resiliency: Exploring global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pp. 81-99). Taylor & Francis Group.
- Paton, D., & Jang, L. J. (2016). Earthquake readiness and recovery: An Asia-Pacific perspective. In S. D'Amico (Ed.), *Earthquakes and their impact on societies* (pp. 647-663). Springer.
- Paton, D., Jang, L., & Irons, M. (2015). Building capacity to adapt to the consequences of disaster: Linking disaster recovery and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In D. Brown (Ed.), *Capacity building: Planning, programs and prospects* (pp. 85-114). Nova Scientific.
- Paton, D., Jang, L., & Liu, L. (2016). Long term community recovery: Lessons from earthquake and typhoon experiences in Taiwan. In H. James & D. Paton (Eds.), *The consequences of disasters: Demographic, planning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pp. 65-84). Charles C. Thomas.